

刘宁 著

唐宋诗学与诗教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唐宋诗学与诗教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宋诗学与诗教/刘宁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2012.8

ISBN 978-7-5161-1363-9

I. ①唐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唐诗—诗歌研究②宋诗—
诗歌研究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6579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郭晓鸿
特约编辑 王冬梅
责任校对 邓晓春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-64070619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21.75
插 页 2
字 数 367 千字
定 价 56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电话:010-64009791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引言

在诗歌史和思想史的互动中理解“诗教”

《礼记·经解》云：“其为人也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。”中国古典诗学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，即是“诗教”。这一观念深刻地传达了中国诗学的教化内涵，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艺术追求。

然而，何谓“诗教”？这个问题很难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，“诗教”既内在于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脉络，又与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，其精神艺术内涵，只有放在诗歌史与思想史的复杂互动中，才可以得到深入的理解。古人对“诗教”的阐发，并未形成系统的表述，自20世纪以来，巨大的社会文化变动，对“诗教”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在新的时代，人们试图赋予诗歌新的社会文化功能，以取代传统“诗教”观中的思想“糟粕”，而纯文学观念的流行，使得“诗教”常被视为古典诗学的“局限”，认为古人对“诗教”的关注，导致了对艺术性的忽视。在具体的研究中，有关“诗教”的讨论，也多集中于诗经学、理学、讽谏文学等对象来展开。诗经学的研究，对诗经学阐释中的“诗教”思想多有勾勒，南宋理学对“诗教”有突出的强调与阐发，进而对古典诗学产生影响，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。此外，对汉乐府以来讽谏文学的研究，细致地讨论了讽谏精神传统，成为“诗教”研究的一个重要脉络。但总的来看，“诗教”的研究，尺幅不宽，未能充分将其置于广阔的诗学与文化背景中来观察。唐宋诗学孕育于以儒学转型为核心的唐宋文化变革之中，与“诗教”有极为深刻的关联。本书即试图立足诗歌史与思想史的内在联系，从诗体源流、诗学的古今转型以及中外交融等多重视角，反思唐宋诗学，探讨其与“诗教”的复杂关系。

唐宋时期，艺术与思想的万千风光，使“诗教”呈现出异常丰富的内

涵。本书联系郭店楚简等新出土文献为思想史研究带来的新进展，进一步分析“诗教”观与儒家思孟学派等先秦思想流派的复杂渊源关系，并结合唐宋思想史的变化，分析唐宋诗教观念的理论渊源及其在诗史中的展开。书中集中讨论了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欧阳修、朱熹等在诗教发展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，剖析了情志论、文质论、诗教与政教、风雅观以及性理思想与诗教之关系等问题。

本书亦立足诗体的源流演变，观察唐宋诗史的独特轨迹，反思其思想文化内涵。围绕杜甫五古、贾姚五律、荆公绝句、欧阳修平易诗风、唐代女诗人的诗体偏好与艺术选择等问题，分析诗人的艺术选择及其思想文化背景。同时，本书还从诗学的古今转型与中外交融等角度，反思唐宋诗学的核心问题，其中包括中国 20 世纪对李白的浪漫主义解读之反思、近世性与中唐文学阐释之关系的分析、以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为中心的唐宋诗学与近代诗学之关系的省思，以及对如何研究诗史低潮期的讨论。这些观察，试图在深入唐宋诗学内在脉络的基础上，以更多元的视角，观察唐宋诗歌与其文化语境的互动，为理解“诗教”在诗史与文化中的展开，提供更开阔的平台。

本书希望在多重视野的观照下，立足诗歌史与思想史的联系，认识唐宋诗学与诗教的复杂内涵。希望有关的思考，不仅能呈现唐宋诗学的丰富脉络，而且能对“诗教”的历史内涵、文化意义，以及这一观念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命运作出反思。

目 录

引言 在诗歌史和思想史的互动中理解“诗教”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 唐宋思想史与“诗教”演变

毛诗诗教观与思孟学派的思想联系	(3)
杜甫忠君体验与诗教:对楚骚传统的变化	(20)
白居易诗教观与白诗中的“情”	(41)
中古文论中“文质论”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旨趣	(52)
“质文相救”与李白《古风》其一的解读	(67)
王维《洛阳女儿行》的礼制解读	(79)
晚唐五代诗学之尚丽观念:与风雅观的联系	(84)
欧阳修《诗本义》与毛诗说诗立场的分歧	(97)
李退溪与朱熹诗风差异及其性理思想的分歧	(110)
性理思想与宋代诗论对李齐贤的影响	(123)

二 唐宋诗史与诗体源流

杜甫五古的艺术格局与杜诗“诗史”品质	(139)
“求奇”与“求味”:贾姚五律的异同及其在唐末五代的流变	(155)
欧阳修诗歌的平易特色	(172)
宋调的形成与韩、白、欧三家诗	(185)
荆公绝句的体制渊源与艺术创新	(201)
唐代女性诗歌特点:以娼妓诗和女冠诗为中心	(215)

女词人的独特贡献:李清照的《词论》	(23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三 唐宋诗学的多元反思

李白是浪漫诗人吗?	(243)
翻译王维有几种方式?	(260)
“近世性”与中唐文学	(267)
如何研究诗史低潮期:以晚唐五代为例	(284)
唐宋诗学与诗文关系:赵执信的诗文关系思考	(311)
近代诗学的唐宋渊源:《人间词话》的诗学趣味	(327)
后记	(342)

—

唐宋思想史与“诗教”演变

毛诗诗教观与思孟学派的思想联系^①

毛诗是汉代诗经学的重要代表，自唐代《五经正义》《诗》主毛诗之后，更以诗学独尊的地位而流泽广被。毛诗对儒家诗教观作了丰富系统的阐发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艺术的抒情传统；然而由于内涵复杂，毛诗诗教观的一些核心观念该如何理解，尚多争议。毛诗虽出于汉代，但渊源于孔门诗教传统，与先秦儒家思想有密切的联系，传统上，人们普遍认为毛诗传自荀子，并从荀子之学的影响来分析毛诗之旨趣，然而近年来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特别是郭店楚简、上博简等出土文献的面世，毛诗与思孟学派的联系逐渐引起关注；但有关的讨论留有许多待发之覆，本文即试图对毛诗与思孟学派的思想联系作进一步思考，反思毛诗一些核心的诗教观念。

一 问题的提出

毛诗传自荀子，在历史上一直是个流行的看法，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云：“孔子删《诗》，授卜商。商为之序，以授鲁人曾申，申授魏人李克，克授鲁人孟仲子，仲子授根牟子，根牟子授赵人荀卿，荀卿授鲁国毛亨，毛亨作《诂训传》以授赵国毛萇。时人谓亨为大毛公，萇为小毛公。”^② 清人汪中《述学·荀卿子通论》亦有类似看法。^③ 这样一个传授谱系，在今天由于文献不足征，因此难以完全论定其是非，但受此影响，人们多从荀子之学的影响来认识毛诗的诗教思想，例如对《诗大序》著名的“诗言志”说，一般将其追溯到荀子“诗言是其志也”^④ 的主张，对于

① 本文原载于杜维明主编《思想·文献·历史：思孟学派新探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。

② 陆玑：《毛诗草木虫鱼疏》卷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，第70页。

③ 汪中：《述学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，中华书局1991年版，第87—90页。

④ 王先谦集解：《荀子集解·儒效》，诸子集成本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第84页。

《诗大序》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^①之论，也从荀子的礼论思想来解释。20世纪末出版的权威性的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》（王运熙、顾易生主编），其中有关毛诗诗教观的讨论，基本上着眼于荀学的影响^②，这代表了传统上的流行认识。

近年来，有关的研究开始注意到毛诗与先秦思孟学派的联系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其一，毛诗与思孟学派的性情理论的联系；其二，毛诗“以史说诗”的阐释方式与孟子“知人论世”说的联系。

毛诗与思孟学派性情理论的联系，是在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面世后受到注意的。虽然目前还没有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，但一些有关《孔子诗论》的研究已经透露出个中消息。《毛诗序》提出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”，又说“情动于中，故形于言”。^③这里所说的“志”与“情”究竟该如何理解，一直有许多争论。从荀子之学的思想格局出发，“情”作为自然人情，应当是受到否定的对象，既然毛诗被认为源出于荀子，那么《诗大序》何以既肯定“志”，又同时肯定“情”对诗的重要意义？顾易生、蒋凡所著《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》提出，《诗大序》在受荀子之学影响的同时，也接受了楚地以屈原为代表的重视“发愤抒情”的传统的的影响，因此能情志并重。^④但这一解释揣测之处较多。随着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的面世，对这一问题，有了更为充分的解释。学者们普遍注意到《毛诗序》与《孔子诗论》关系密切，即使完成于东汉时期，其内容也与先秦诗学联系紧密。^⑤《孔子诗论》在思想上，可以溯源于先秦子思学派的性情论。^⑥上博简《性情论》等有关文献，既表现了以礼节情的主张，又对“情”本身给予肯定，而《诗序》“情”、“志”并重的主张，或者可

① 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：《毛诗正义》，李学勤主编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北京大学1999年版，第15页。

② 顾易生、蒋凡：《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401页。

③ 《毛诗正义》，第6页。

④ 同上书，第401—402页。

⑤ 关于《孔子诗论》与《毛诗序》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，参见王小盾、马银琴《从〈诗论〉与〈诗序〉的关系看〈诗论〉的性质与功能》，《文艺研究》2002年第2期；陈桐生《〈孔子诗论〉研究》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240—256页。

⑥ 李学勤认为，“《孔子诗论》涉及性、情、德、命之说，可与同出《性情论》（郭店简《性自命出》）等相联系”，参见朱渊清、廖名春主编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52页。

以溯源于此。陈桐生《〈孔子诗论〉研究》对此阐述得最为充分。^①由此，毛诗与先秦思孟学派的思想联系，也随着《孔子诗论》的研究开展而得到呈现。

至于毛诗“以史说诗”的阐释方式，则被溯源于孟子“知人论世”的主张。在汉代诗经学中，作为古文的毛诗，与作为今文的三家诗，一个显著的差异就在于毛诗充分地运用“以史说诗”的方式，建立了完备的“以史说诗”的阐释体系，它将诗经的风雅正变，与周王朝的兴衰若合符契地联系起来，从而传达其美刺教化的诗教精神，郑玄所撰《诗谱》对这一体系，作了最为充分的阐述。这样的说诗方式，被认为与孟子的“知人论世”观有密切的联系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：“孟子谓万章曰：‘一乡之善士，斯友一乡之善士。一国之善士，斯友一国之善士。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，又尚论古之人。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’”^②这种“论世”以“知人”的看法，虽然在孟子并不是专门针对诗学而发，但在后世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诗学的阐释传统，而毛诗的“以史说诗”则被视为“知人论世”的体现。^③

这些看法，开始揭示毛诗与思孟学派的联系，使人们看到，单纯从荀子之学的影响，不足以认识毛诗诗教精神的复杂内涵，但上述讨论尚有许多值得反思与深思之处：一方面，毛诗的诗教观，究竟有怎样的诗学内涵，有关的研究多据《诗大序》立论，而未能联系小序及毛传、郑笺之全体，因此毛诗的基本诗学阐释品格，未能得到清晰的梳理。^④毛诗和《孔子诗论》虽同出孔门诗教，但彼此还是多有差异，不能单纯借鉴《孔子诗论》与子思学派性情思想的联系来认识毛诗的诗教观念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出土文献的面世，先秦思孟学派复杂的思想内涵也随之得到呈现，如何基

① 参见陈桐生《〈孔子诗论〉研究》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125—136页。

② 赵岐注，孙奭疏：《孟子正义》，李学勤主编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91页。

③ 顾易生、蒋凡：《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》，第409页。

④ 本文讨论毛诗，是将毛诗序、毛传、郑笺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，毛诗序与毛传的复杂关系，前人多有讨论，但从三家说各有其序的角度来看，毛诗序与毛传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，而郑笺虽然与毛传或有不同，但主要还是在阐发毛传之旨意。毛诗的诗教观正是通过序、传、笺的共同构建而形成。关于毛诗序、传、笺之关系，参见洪湛侯《诗经学史》（中华书局2002年版，第156—205页）、冯浩菲《历代诗经论说述评》（中华书局2003年版，第152—172页）等的论述。

于这一复杂的思想内涵来观察毛诗的诗教精神，还多有可为之处。本文即试图联系思孟学派之思想，对毛诗诗教观的“情志”说及“以史说诗”的美刺说等核心问题，作一些新的思考。诗教是儒家教化观的重要体现，而毛诗又对儒家诗教观作了最丰富、最有体系的阐发，本文也希望通过毛诗诗教观的思考，进一步体会儒家、尤其是思孟学派教化观的复杂内涵。

二 毛诗“情志”说与思孟学派对道德情感的认识

《毛诗大序》论诗之源起，强调了“志”与“情”两个方面，一面是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^①；另一面则是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^②；又云“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。……故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”^③。

毛诗所谓的“志”与“情”，其内涵是什么，两者有什么关系，比较通行的看法是，“志”一般指符合伦理道德的思想志尚，而“情”则是指自然人情。^④《诗大序》所说的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则体现了以“礼”约束“情”，使之合乎规范。因此，诗的根本追求，在于表现内心之“志”，表现符合伦理道德的志尚，而“情”虽然引动了诗兴，但却需要“以礼节之”，是一个被约束和抑制的对象。这样的理解推而极之，就会认为毛诗的诗歌观念，重道德伦理的传达，而轻视诗人个性情感的表达，其“情志”说以“重志抑情”为核心。在通行的文学思想史中，毛诗的诗教观，被放在了以肯定诗人个体情感为宗旨的“缘情”说的对立面^⑤，“言志”与“缘情”成为传统文学观念重理与重情的两极。从思想渊源上，这种“重志抑情”的“情志”观也进一步佐证了荀子之学的影响。

这样的理解，是否符合毛诗诗教观“情志”说的实际，还是很值得反

① 《毛诗正义》卷1，第6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书，第15页。

④ 顾易生、蒋凡：《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》，第402页。

⑤ “缘情”一语，出自陆机《文赋》“诗缘情而绮靡”，近人文学思想史，将魏晋文学自觉以后形成的注重个性情感之抒发的文学观，称为“缘情论”，与“言志”的文学观相对。

思。近年来，陈桐生等人对《孔子诗论》与子思学派之思想联系的分析，也为重新认识毛诗“情志”观提供了启发。陈氏认为，《孔子诗论》对“情”的意义给予充分重视，善于以情说诗，这与上博简《性情论》、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等文献中“道始于情”、“情生于性”的主张有密切的联系，体现了子思学派的性情思想在诗学上的影响。与此同时，有许多学者指出，《孔子诗论》与《毛诗序》多有接近，这些研究都使我们更明显地意识到以“重志抑情”来理解毛诗的“情志”说，或非毛诗之本意，而毛诗的思孟渊源也初步得到呈现。

然而，要全面揭示毛诗与思孟学派的思想联系，单纯借鉴《孔子诗论》的有关研究是远远不够的。第一，毛诗虽然与《孔子诗论》同出孔门诗教，但从诗序到毛传郑笺，其诗学阐释体系完备，内涵丰富，特别是在一些基本的诗学旨趣上，与《孔子诗论》多有差异，因此，不能以《孔子诗论》的说诗特点，简单类比毛诗；第二，《孔子诗论》约成书于子思之后，孟子之前^①，而毛诗出于汉代，因此，应当立足思孟学派的完整思想形态，观察毛诗与之内在的联系。

具体到“情志”这个问题，《孔子诗论》有很明显的以情说诗的特点，对所评论的篇目，重视揭示其所抒之情，如第二十二简“《宛丘》曰：‘洵有情，而亡望’，吾善之”；第十八简“《杕杜》，则情喜其至也”；第十六简则以“闷”概括《邶风·柏舟》之情。同时，《孔子诗论》表现出以礼节情的旨趣，如它称赞《关雎》，是因为《关雎》能从男女思慕之情转向以礼节之，所谓“《关雎》之改，则其思益矣”（第十一简）。重情和主张以礼节情，是《孔子诗论》的两个核心内容。

毛诗虽然也讲“情”，也讲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但联系毛传郑笺完整的阐释旨趣来考察，可以发现，其与《孔子诗论》有很明显的不同。第一，《孔子诗论》以情说诗，但它并未区分诗中之情是自然人情，还是道德情感，而毛诗对诗意的阐发，则着力揭示其中的道德情感，其论情必与志协合为一。第二，《孔子诗论》将诗教的基础建立在以礼节情之上，而毛诗论诗教之效，不重节情，而重风化，即强调诗教的根本，在于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”的风化之效。

《孔子诗论》论诗中之情，多数都很难区分，是自然人情还是道德情

^① 陈桐生：《〈孔子诗论〉研究》，第96页。

感，毛诗对诗意的阐发，则着力揭示其道德之情，这一点在关于《关雎》的阐释中，有非常典型的体现。《孔子诗论》认为《关雎》是“以色喻于礼”（第十简），其可贵之处则在于诗意体现了对“色”这样的自然人情以礼节之，所谓“《关雎》之改”（第十简），即是此意。在毛诗的阐释中，《关雎》则完全体现了“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”（《毛诗序》）^①的后妃之德，而诗中“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”，“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”^②的情语，就成了文王太姒“哀窈窕，思贤才”这种道德情感的流露，这样的情感贯注全篇，完全看不到任何男女思慕之情的痕迹。毛诗这种阐释方式，自北宋欧阳修以来，就不断受到非议，责其故为迂曲之论^③，但事实上，这体现了毛诗论情必与志协的深刻用心。又如《孔子诗论》第二十九简“《卷耳》不知人”，这里的“不知人”，马承源、廖名春等人解释为不知所怀之人在何处，这同样很难区分是自然人情的相思，还是道德情感中的思慕贤人。毛诗序解此诗“《卷耳》，后妃之志也，又当辅佐君子，求贤审官，知臣下之勤劳。内在进贤之志，而无险诋之心，朝夕思念，至于忧勤也”^④。可见，诗中的怀人之情，在毛诗看来，当是思贤的忧念之情。毛诗所理解的诗作者，是具有深刻的志尚与丰富的道德情感的主体，而《诗经》的可贵，正在于它传达了诗作者的基于伦理道德的“志”与“情”。毛诗着力将在其他阐释者看来是自然人情的内容，向道德情感的方向阐释，这在它所认为的正风、正雅中，有鲜明的体现；然而，对那些状淫乱之状、达褻慢之情的变风、变雅，毛诗何以贯彻其对道德情感的强调呢？

《诗大序》有“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的说法，人们容易将它与以礼节情的思想联系起来，事实上，毛诗于此是专门针对“变风”而论，对于正风、正雅，此一原则并不适用，其内涵也并不简单等同于以礼节情。我们注意到，毛诗对变风诸诗的阐释，多是将诗人理解为一旁观者，在陈

① 《毛诗正义》，第21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26页。

③ 欧阳修认为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是“以述文王太姒为好匹”之意，而毛郑竟以“淑女”为“三夫人九嬪御以下”，“《关雎》本谓文王太姒，而终篇无一语及之，此岂近于人情，古之人简质，不如是之迂也”（欧阳修《诗本义》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，第70册，第183页）。

④ 《毛诗正义》，第36页。

述时事的淫乱昏暴的同时，表达怨刺之情，诗中所陈述的淫乱之情，是“发乎情”，而诗人所表达的怨刺之情，则是“止乎礼义”；前者是“民之性也”，后者是“先王之泽也”。变风的核心，不在于陈述乱状本身，更不在于渲染其中的淫褻之情，而在于其中所传达的忧世之志与怨刺之情。因此，毛诗特别强调，变风的作者，不是诗中人物，而是旁观的“国史”，其《毛诗序》云：“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变雅作矣。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。”^①对这个“国史”的说法，后人多有不解之处，孔颖达就认为“明晓得失之迹，哀伤而咏情性者，诗人也，非史官也”^②。然而由于要遵守疏不破注的原则，对于自己与毛传的不同，孔颖达勉力弥合，提出：“言明其好恶，令瞽矇歌之，是国史选取善者，始付乐官也。”^③将国史的选诗之责，与《诗序》所说的作诗之职混而为一。事实上，毛诗一定要为变风预设一旁观的作者，并且突出这一旁观视角，其目的只在于要从道德情感来阐发诗意，而不愿突出变风作品中的流连荒亡的自然人情，这一番良苦用心，落实到诗意的解释，有时便不免迂曲曼衍之弊，人们因不了解其用心，而讥其好为衍说的批评，也所在多有，例如《卫风·氓》，此诗从辞意本身来看，述一女子被男子抛弃后的痛苦，《小序》则云：“刺时也，宣公之时，礼义消亡，淫风大行，男女无别，遂相奔诱。华落色衰，复相弃背。或乃困而自悔，丧其妃耦，故序其事以风焉。美反正，刺淫佚也。”^④按照这样的阐释，诗作者就不是诗中的女子，而是“序其事”者，全诗也是通过旁观的叙事视角来展开，郑笺认为，诗中“于嗟鸠兮，无食桑葚；于嗟女兮，无与士耽”等语，是“国之贤者”对女子的告诫。^⑤欧阳修对这一说法表示不满，他认为这几句不过是“诗人序述女语尔，不知郑氏何从知为贤者之辞，盖臆说也”^⑥。欧阳修讥郑氏割裂文义，横生枝节，而郑笺不过是要突出“序其事”者的旁观视角，强化对于女子之行的反思感慨之意。

毛诗对自然人情的排斥，对道德情感的尊重，展现了其“情志观”的

① 《毛诗正义》，第14—15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15页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同上书，第228页。

⑤ 同上书，第230—231页。

⑥ 《诗本义》，第201页。

复杂内涵。我们也许可以将其概括为立足道德情感的“情志合一”论。依据这样的“情志观”，毛诗所理解的诗人，就不是单纯懂得以礼来克制自然情欲的人物，而是有着充分道德自觉的德性主体，因其德性的内在而具有深厚的道德情感，而诗教的力量正体现为这些情志丰富的德性主体对人的风动感化。因此，毛诗论诗教，并不倾向以礼节情的思路，而是将诗教的基础建立在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”的风化观之上。《诗大序》提出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，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风，风也，教也，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”^①；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”^②；“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”^③。这里涉及对诗经“六义”之一的“风”的理解。《周礼·春官》有“六诗”之说，与《诗大序》所言“六义”一致，即“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”。其中风、雅、颂之义，前人众说纷纭^④，而目前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，风、雅、颂是乐调之名。孔子言诗教，在古老的采诗观风的思想的基础上，对国风之义作了解释：“邦风其纳物也，溥观人俗焉”（《孔子诗论》第三简），即国风所以观民风者也。毛诗对“风”的解释，从“观风知政”转向“风动教化”，这是对孔门诗教观的重要变化，而它认为《诗经》所以能“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，就在于这种风化的力量。

这种风化之力，与传统的乐教思想多有不同。在周代，诗乐一体，诗教与乐教的关系本极密切。《毛诗大序》不少论述，与乐教之语接近，如论诗、乐、舞一体，所谓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^⑤；论乐与政治的关系，所谓：“治世之音，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国之音，哀以思，其民困。”^⑥ 这些意见，与《礼记·乐记》

① 《毛诗正义》，第4—6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13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15页。

④ 张西堂对前人的有关意见进行了综述，计有关于“风”的意见14种、关于“雅”的意见7种，关于“颂”的意见4种，见张西堂《诗经六论》，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，第106—115页。

⑤ 张西堂：《诗经六论》，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，第6页。

⑥ 同上书，第8页。